

重庆市志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九卷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志

第九卷

商贸志

主 修	王鸿举	
主 审	谢小军	张明树
总 编	周焕强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市志·第九卷/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

ISBN 7-5621-3420-0

I.重... II.重... III.重庆市—地方志 IV.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706 号

责任编辑 张渝佳 叶晓丽

封面设计 吴庆渝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重庆市志·第九卷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新闻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排版

重庆巴南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3.5 字数:732千字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621-3420-0/Z·66

定价:148.00元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张文周(兼,1994~1995)

叶贵本(兼,1999~2000)

蒋国昌(2000~2002)

周焕强(2002~)

副主任 王泰来(1999~2000)

王昭林(2000~)

黄家琦(2003~)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总 编 辑 陶维全(兼,1985~1993)

蒋国昌(2000~2002)

周焕强(2002~)

副总编辑 吉崇寿(1986~1989)

周永林(兼,1986~1990)

彭伯通(兼,1986~1997)

罗传勖(1989~1997)

余楚修(1994~1999)

王泰来(1999~2000)

王昭林(2000~)

黄家琦(2003~)

《重庆市志》(第九卷)编纂人员

主 编 余楚修

编 辑 何文君 潘锡荣

编撰初稿人员

柳 松	张章就	高凤章	吕计桃	罗秀蓉	李 兵
田志华	彭 岚	雷志华	苏显吾	何良知	杜 若
张德珍	王本立	刘启遥	彭方中	周学丰	李运秣
黄廷举	苏邑锟	张龙永	路华松	何文君	潘锡荣

提供初稿单位

重 庆 市 商 业 委 员 会

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

重 庆 市 粮 食 局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重庆市物资(集团)公司

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一、记述时限:本志上限为 1840 年,下限为 1985 年,重点记述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以后的历史,个别情况根据内容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记述范围:本志坚持属地原则,记述范围原则上以 1985 年底重庆市的行政区划范围及市级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范围为准。

三、体例:本志遵循横排竖写和按事类分卷设志的原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坚持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文体:本志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性文体;除引文和某些古代人名、地名、机构名、职官名按规定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外,一律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使用,按国家技术监督局的规定执行。

五、历史纪年及时间表述: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前采用历史年号纪年,其月、日采用农历,使用汉字;1912 年 1 月 1 日后采用公元纪年,其月、日采用公历,使用阿拉伯数字。采用历史年号纪年时,在同节文字中多次出现同一年号时,首次出现的要夹注公元纪年,其后出现的可不再夹注公元纪年。在记述大的时期时,使用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因重庆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以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为“解放后”,此前为“解放前”。在使用世纪、年代时,20 世纪前一律标明××世纪;20 世纪第一次出现标明 20 世纪××年代,以后省略世纪,直接标明××年代。

六、称谓:本志中机构、会议、职务、地名、人物称谓,一律按该历史时期的规范称谓或习惯称谓记述;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古地名夹注今地名。

七、数据、数字及计量单位:引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主管部门为辅;数字表述,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的规定;计量单位,除少数记载过去的事情采用旧计量单位外,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目 录

综述	(1)
第一章 商贸组织及机构	(34)
第一节 管理机构	(34)
第二节 市级公司	(71)
第三节 商民团体	(87)
第二章 商贸设施	(92)
第一节 商业网点	(92)
第二节 饮食服务业网点	(97)
第三节 市镇粮店	(99)
第四节 仓储运输	(101)
第三章 商贸政章	(110)
第一节 商业政策	(110)
第二节 粮油政策	(117)
第三节 物资政策	(121)
第四节 外贸政策	(126)
第五节 价格政策	(133)
第四章 财务会计	(137)
第一节 商贸业财务会计	(137)
第二节 供销社财务会计	(146)
第三节 粮油财务会计	(162)
第五章 商业贸易(上)	(186)
第一节 百货行业	(206)
第二节 纺织针织行业	(210)
第三节 五金行业	(213)
第四节 交电行业	(214)

第五节 化工行业	(216)
第六节 煤建行业	(219)
第七节 石油行业	(221)
第八节 医药行业	(222)
第九节 储运行业	(224)
第十节 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	(226)
第十一节 工商联营	(228)
第六章 商业贸易(下)	(232)
第一节 食品行业	(232)
第二节 蔬菜行业	(237)
第三节 水产品行业	(240)
第四节 盐业行业	(243)
第五节 糖酒行业	(243)
第六节 糖果糕点行业	(247)
第七节 酿造调味品行业	(249)
第八节 农资行业	(251)
第九节 土产行业	(254)
第十节 日用杂品行业	(258)
第十一节 干菜果品行业	(264)
第十二节 棉麻行业	(270)
第十三节 中药行业	(274)
第十四节 物资回收行业	(275)
第十五节 集市贸易	(282)
第七章 饮食服务	(287)
第一节 管理机构	(288)
第二节 饮食业	(289)
第三节 服务业	(293)
第四节 冷食品业	(297)
第八章 粮油贸易	(298)
第一节 粮油收购	(298)
第二节 粮油销售	(312)
第三节 粮油调运	(340)
第四节 粮油加工	(348)
第九章 物资贸易	(364)
第一节 物资管理	(364)
第二节 物资供应	(367)

第三节 物资储运	(368)
第四节 生产建设用主要物资消费量	(370)
第五节 物资消费使用方向	(373)
第六节 物资行业	(373)
第十章 区县商业	(381)
第一节 市中区商业	(381)
第二节 江北区商业	(384)
第三节 沙坪坝区商业	(387)
第四节 南岸区商业	(391)
第五节 九龙坡区商业	(393)
第六节 大渡口区商业	(396)
第七节 北碚区商业	(400)
第八节 南桐矿区商业	(402)
第九节 双桥区商业	(407)
第十节 巴县商业	(408)
第十一节 綦江县商业	(411)
第十二节 长寿县商业	(413)
第十三节 江北县商业	(418)
第十四节 永川县商业	(420)
第十五节 江津县商业	(422)
第十六节 合川县商业	(426)
第十七节 潼南县商业	(430)
第十八节 大足县商业	(436)
第十九节 铜梁县商业	(439)
第二十节 荣昌县商业	(442)
第二十一节 璧山县商业	(445)
第十一章 对外经济贸易	(449)
第一节 概况	(449)
第二节 开埠前后的外贸企业	(456)
第三节 出口贸易	(459)
第四节 进口贸易	(474)
第五节 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	(476)
第六节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484)
第七节 对外贸易储运	(485)
第八节 出口商品包装	(486)

综 述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川东南延伸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四川南部山区的结合部，是盆地较低的部分。境内众多河流与长江直接相通，构成中国西部最大的水道运输网。重庆主城区处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自古以来就是商品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重庆在古代就与四川各地、黔滇部分地区以及甘南、陕南、湘西北、鄂西北等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中国西南较为发达和繁荣的商业城市。

一、古代巴渝地区的商贸业简要情况

西周时期，重庆是巴国的都城，经济文化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 1954 年在巴县冬笋坝发现的巴国时期的船棺墓、土坑墓群，出土虎纹铜兵器、犀牛纽印章、铁刀、铁斧等文物近千件；1972 年，在涪陵的白涛山田溪发现的巴人墓群，出土有成套的错金编钟等文物近百件，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华阳国志·巴志》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纴、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蒟、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贵者，有桃支、灵寿”。这些物产也可见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据《元和志》卷 33 合州（今合川）：“铜梁山在县南九里……山出铜”，铜梁之得名就是因为该县盛产铜。《四川通志》载：“重庆府的合川县产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柚而非，若柚而芬芳，冬夏华实相继”。给客橙又叫四季柑，产于江州等地。《华阳国志·巴志》载：“汉时，郡治江州巴水北，有柑橘官。”东汉时期，重庆现在的巴县、江津等地已发展成柑橘的大产区，开始设柑橘官管理。《华阳国志》还说江州北有稻田所产大米进贡于皇帝，称御米。巴渝地区物产丰富，部族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多，部族之间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出现，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逐步形成。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也。”这个最早设立江州城外的市场是在今九龙坡区冬笋坝。据《水经注》卷 33 记载：在巴郡小城邑里有市，几天一集，如“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县有市肆，四日一会”。战国时期，巴蜀一带的商民早已与西南各民族有了经济上的往来，巴蜀

的漆器、铁器、农具、丝绸和其他商品已运销西南各地。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国后，在原巴国地区建立巴郡，江州为郡治所在。秦政权巩固后，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能腾出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家庭手工业或经商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增加，用于交换的品种和数量逐步增多。尽管秦实行抑商政策，对商贸业管理较严，但巴郡从事商业的人口还是不断增加，到西汉末期，江州已成为西南夷人商贸最盛之地，商业日益繁荣。据《盐铁论》记载：巴蜀已成为当时全国十大经济区域之一，商人们在这片地区从事买卖活动。重庆借长江水道不仅与上游地区商业交往频繁，与中下游的商业往来也日益增多。《隋书·地理志》中说：重庆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川马、蜀锦是这里的主要输出品，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大商人也到此经商。秦汉时期，商业由于有了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商品交换流通更为方便，商品交换市场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当时江州城的市场除北府城集中在嘉陵江口的江北城外，还有南府城集中在今市中区下半城外，在今江北刘家台、香国寺和南岸涂山脚下一带，也有街市和村庄；在今沙坪坝区的嘉陵江沿岸的化龙桥、土湾、沙坪坝、磁器口和九龙坡的长江岸边，也有一些居民点；另在江州城的两江还有 500 余家“结舫水居”的以长途贩运为主的人口。秦汉时期，江州城已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川滇缅印古道）两大起点之一。在秦统治巴蜀期间，就曾将巴郡和蜀郡的蚕丝和丝织品外运印度。到了西汉，这种商贸继续发展，输出大量丝绸及土特产品，输入大量琉璃品、琥珀、水晶、犴虫、翡翠、宝石、珠宝等。

东汉末年至隋唐时期，巴渝地区经受了 500 多年的战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很大破坏，商业趋于萎缩。到唐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南移到长江下游地区。长江水道交通的日益发展，推动了长江流域经济交流的发展。重庆扼两江的汇合口，与长江中下游及四川北部、东部的经济往来增多，商业又趋繁荣。唐代诗人王维舟过重庆时留下了“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的诗句，就是当时重庆沿江市场兴盛的写照。到了宋代，重庆商业有进一步发展。据《文献通考》记载，从商税额来看，重庆府已成为年征商税 20 万贯以上的八大城市之一，也是西南最大的物资转口贸易城市，长江上游地区主产的布匹、绢帛、粮食、食盐、茶叶、药材等商品大量经重庆转口长江中下游出售。在江州商贸业的发展带动下，岷江、沱江、嘉陵江沿线许多县城及交通要道的小城镇也陆续发展起来。如今合川、宜宾、泸州等城市，在宋代已形成商业较繁荣的小城市。

元朝、明朝和清朝初期，重庆地区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物价飞涨，商业又走向萧条。

清初，经过休养生息，重庆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耕地、人口已有大量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也不断增加。据《巴县志》等地方志记载：乾隆年间，重庆地区以合州为中心包括铜梁、璧山、永川等县，民间养蚕“多者以数屋计”，其丝“多不自缫织，售予贩者”，故城乡有丝市、蚕市，远近商贾云集。合州太平镇织的绸缎，远销各地，还作为贡品献给皇帝。荣昌地产苧麻织成的夏布，行销各

地，为著名的巴渝特产。城镇的棉纺织业、制糖业、造纸业和陶瓷业、制盐业、矿冶业等手工业作坊、工场大量出现，雇佣的工人愈来愈多。这种由农村经济的发展，给城市经济工商业的发展提供的资金和劳动力，正是封建制度下传统商业城市赖以发展的源泉。到清代中叶乾隆年间，重庆府城大小街巷已达 240 条，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史称“九门舟楫如蚁”、“楚客吴商满市尘”，人口发展到 10 余万户，城内居民爆满，只好在两江沿岸又发展街市 15 厢。清代重庆通过长江转口中下游的商品，以川米、川盐、山货、棉花、棉纱、棉布、木材等为主，如川米每年贩运长江中下游的达 150 万担左右；川盐的市外销售在 1 亿斤左右。清代重庆的对外贸易，在开埠前由于没有直接出口权，进出口的商品数量、金额都很小，主要有部分山货、丝及丝织品等经广州、上海等口岸转销国外。

二、开埠前后重庆地区的商贸业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入侵，把对华贸易由沿海、沿长江推进到内陆腹地。同治十年（1871 年），英、法、美三国洋行雇 69 艘民船载洋货上驶重庆，被四川夔关扣留，次年清政府慑于英、法、美政府压力，发还货物运往重庆倾销。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实现了将宜昌开为商埠的目的，并使英国获得了“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特权。光绪十六年（1890 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第二年重庆正式开埠，英国在重庆取得开埠通商的特权。同年 3 月 1 日以英国人霍伯森为税务司的重庆海关正式开关。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使重庆继英商之后又为日商开了埠，日本由此取得了轮船驶入重庆和在重庆建工厂的特权。根据《马关条约》的条款，凡日本取得的权益，其他各国都可以“利益均沾”，由此重庆就成为西方各列强共同的商埠。此后，法、日、美、德等国便陆续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接着日本领事又与川东道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条约书》，取得了在重庆南岸王家沱 420 亩地上建立日本专管租界的特权。光绪三十年（1904 年），各国驻渝领事又怂恿重庆海关税务司在城内强行租地，与川东道签订了《永租打枪坝约》，把打枪坝一片土地永远租给洋人把持，成为外国驻渝领事馆的专用区。紧接着，英、日、法、德、美等国，大量开办洋行和工厂，大量倾销洋纱、洋布、煤油、柴油、灯具、鱼烛等商品，同时大量贱价收购工业原材料和土特产品。

重庆开埠后在客观上促成了重庆封建经济的解体，使近代民族工商业开始萌芽，加快了重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外贸口岸。开埠前的光绪元年（1875 年），重庆洋货进口值仅为白银 15.6 万海关两；第二年宜昌开埠后，由宜昌海关开具子口单，洋货即可进入重庆，使重庆洋货进口值一下增至 115.7 万海关两；到重庆正式开埠的光绪十七年（1891 年），洋货进口总值又增至 445.46 万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 年），又增至 1 255 万海关两，1930 年，更增加至 5 106 万海关两。开埠后，洋商在大量

倾销洋货的同时，还大肆掠夺工业原料和土特产品，使出口贸易也迅速增加，开埠前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庆市场出口的土货 105.68 万海关两；到 1916 年，便增至 1 780.34 万海关两。

大量进入重庆的洋货，主要有三种销售方式。一是由洋行自行销售。开埠后各国陆续在重庆开了 48 家洋行和工厂，大多直接销售洋货。如美孚石油公司在重庆设立的美孚洋行，除在城内设有 4 个分店和 1 家专营灯具的商店外，还在郊区的江北、弹子石、大兴场、鱼洞镇、磁器口等地设立分店，以后又在泸州、宜宾、嘉定、成都、南充、遂宁等地设了油库和分销店，并在各小城镇设分店。到 1927 年全川共有 50 多家销售石油的营业点。他们销售的商品主要是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另外还销售灯具、鱼烛、凡士林等。二是通过买办经销。洋行在自销的同时，大多还采用给佣金的办法招商经营洋货。如英美烟草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派华籍职员徐子昂来重庆推销香烟，经过宣传试销成功后，在重庆设立总销、大经销、小经销等一套系统，先后在成都、万县、泸州、内江等地设立分公司。洋总办给总经销、大经销的佣金各为销售总额的 5%，大经销给小经销的佣金为销售总额的 2%。后来，英美烟草公司又另组“南耀烟公司”为四川总经销，不久全川都布满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分销营业点，全面占据了全川的香烟市场。三是通过本地商号销售。在汉口开埠以前，重庆仅有少数兼营洋货的商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庆出现了一批专营洋货的商号。经营洋货的商号，在上海或汉口办货，一般只需给货值 0.5% 的佣金，即可由当地商人或掮客代向外国商人订合同，将货物运到宜昌交货，再由货主改以木船运回重庆销售。

在洋货进口值增长的同时，国货进口值也大幅增长。重庆正式开埠的当年，国货进口总值为 9.4 万海关两，次年即增至 39.9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增至 123.9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增为 452 万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 年），在辛亥革命高潮中，重庆的国货进口值仍达 644.1 万海关两。辛亥革命后，四川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重庆成为川、滇、黔三省军阀争夺的重镇。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重庆的对外贸易下降很大，1912 年进口总值由上年的 1 907 万海关两降到 328 万海关两，直到 1919 年才有所恢复和发展，到 1936 年进口总值 5 369.9 万海关两，其中洋货仅 236.63 万海关两，国货 5 133.3 万海关两，重庆商贸市场又转入以国内贸易为主的状况。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随着市场需求而变化。在进口商品方面，开埠前 8 年以都货、杂货、呢绒、机电五金四大类为主，计 40 个品种。其中棉货占 67.42%，杂货占 24.27%，呢绒占 3.71%，机电五金占 0.36%。在杂货中，主要是钟表、缝衣针、煤油、玻璃器皿等手工业制品和海参、海带、西洋参等食品、药品。到 1930 年，进口商品中，棉货类比重上升到 73.95%；杂货类由占 24.27% 降为 19.95%；机电五金由 0.36% 上升到 4.7%；呢绒由 3.71% 下降为 1.41%。进口棉货的增加，使重庆成为洋纱、洋布在西部的转销中心，四川经营都纱业的大商号均集中在重庆，如首屈一指的棉纱大户汤子敬，流动资金不下四五十万两白银，他经营的裕生厚纱号，买卖十分兴隆。

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开埠后洋行大量收购山货,出口品种由初期的几种增加至30多种。以重庆海关出口的猪鬃、熟皮、生牛皮、羊皮、木耳、五倍子、大黄、麝香、药材等9个品种为例,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891~1895年),9种商品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2万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年)至1915年,年平均出口值即增至578万海关两,增长了4倍。四川的丝绸出口一度因质量下降受到影响,辛亥革命后经过改良蚕种,蚕丝质量提高,出口也大幅增加,获得厚利。重庆各界富人纷纷投资丝业,丝厂逐渐增多。1924年成立的重庆丝业公会,实际上是全川甚至包括整个西南的丝业同业公会。重庆丝业公会会章规定:“凡丝业而区域未在重庆,但必以重庆为转输者均得参加本会,共同扶助,并得享同等之权利”。因而参加重庆丝业同业公会的,既有重庆的铁机丝厂、丝帮,也有川南帮、川北帮、陕西帮、云南帮以及后来加入的广东帮、上海帮。但是繁荣不久,便因四川军阀和洋商的摆布、压榨,以及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使重庆的丝业逐步走向了衰退。

(三)城市市场扩大,商业更加繁荣。开埠后不仅对外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域市的贸易市场也有很大发展。开埠前,重庆的商业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江各门外一带,如太平门外是竹木市场,储奇门一带为药材市场,金紫门江边为柑橘市场,千厮门为棉花市场。开埠后,由于山货出口业的发展,沿江各门外的市场,大多成为牛羊皮等市场。经营匹头、苏货、药材、山货等的大商号、字号则向市商务总会所在地附近的中大街、西大街、西二街、西三街、西四街等地集中,形成了市内的商业中心区。当时市内还有油市街、草药街、木货街、棉花街、麦子市、米亭子、炒房街等数十条专业性的商业街,在这些专业性商业街中,相对地集中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字号,使购货者可在众多同类商品中进行选择。如洋行、匹头、广货铺多集中于陕西街。小布店多集中于杨柳街(今中华路)。金融、洋行、轮船公司、大帮信轿行、邮局等集中在太平门白象街一带,当时一些中外人士称白象街为重庆的“华尔街”。

开埠后,城区商积迅速扩大了两倍左右,新区公路的兴建,商用建筑亦随之出现,公路两侧店铺林立,使重庆繁华的商业区逐步由沿江两岸河边向陆上公路两侧转移发展。

(四)商业行业不断增多,大店、名店不断出现。开埠以前,重庆的商贸业以粮食、食盐、棉花、布匹、山广杂货为主,商业行业亦以上述行业为主。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重庆商业行帮有25个,但由于有的行业是由几个行帮组成的,所以当时的商业行业并投有25个。开埠后,由于商贸业的迅速发展,又出现一些新兴行业,如山货业、煤油业、肠衣业等等。到30年代,重庆的商业已有油、盐、糖、煤、粮、棉纱、匹头、绸缎、苏货、干菜、夏布、川丝、五金杂货、药材、熟药、屠宰、山货、油漆、皮货、餐食、皮革、瓷器、鞋帽、布业、旅栈、服装、煤油、颜料等28个行业。正式向政府登记的商业企业计有1007家,其中注册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有700家。到1936年,全市商业同业公会发展到36个,城区经营工业品店铺增至1651家,餐饮旅店800余家。

由于商贸业的迅速发展,涌现了一投大店、名店。在重庆当时的商贸业中,盐业、钱业、匹头业、棉纱业号称四大商帮,糖、麻、棉花、酒、油、药、烟、干菜称为八大行

业。盐业是当时最大的行业，四川年产盐 600 万担（每担 100 市斤），重庆历来是川盐外销最主要的转输口岸。当时重庆盐商有 60 多家，其中万顺荣、庆和、渠河运商公记、天锡生、福兴玉、大昌祥、同亿义、利川公几家资金较多，规模较大，信誉较好。如天锡生、福兴玉、同亿义、大昌祥、利川公五家大盐号曾年销 100 多万担，占全川产量的 1/5 食盐销售基本被他们垄断。

重庆开埠前，匹头业主要经营仅 1 尺 1 寸的窄幅土布，经营洋布的只有 30 来家，经营额也不太大。开埠后大量洋纱、洋布涌入重庆市场，许多机坊为了求得生存，开始改用洋纱织较宽的白布（宽 2.4 尺）、格子花布、三角呢、线呢、毯子布及各种色布出售。经营洋布的商号也增至 60 多家，其中著名的有裕增祥、聚兴隆、广益祥、资生长、德生裕、聚兴仁等商号、字号。到清朝末期，经营洋布的商号又增加到 90 多家，其中著名的有聚兴诚、裕和通、鸿福隆、吉利祥等一批字号和商号。

山货业。开埠前未独立成帮，由药材业附带经营，当时较为有名的胶房有董家胶房、翁家胶房、粤庆祥等。光绪十六年（1890 年）至 1921 年为洋行垄断。后来经营山货的大户有庆和祥、德和祥、久吉祥、同利祥、裕厚祥等，其中有的是洋行买办企业。

药材业。最初多为外地在渝商家所经营，规模较大的有江西的临帮、广东的广帮、浙江的浙帮、河南的淮帮、陕西的陕帮、湖北的汉口帮、四川的川帮等，统称“药七帮”，后来经过激烈的竞争，川帮击败了外省帮，成为重庆药材业的核心力量。药材业中有咀片铺、择药铺 84 家、药材字号 98 家、药栈 79 家、大批发远销外省的 90 家，他们中著名的有仁济、庆余堂、天元堂、熊长泰、炳泰堂、锡棋生、裕昌盛、义和源、同福源等等。

餐饮业。清朝时期，四川经过约 100 年的大移民，重庆成了“五方杂处”之地，来自各省的移民，都带来了自己的本土饮食文化，以致餐饮业具有各种风味，成为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重庆原有的川菜，通过对来渝其他各式菜系特点的吸收融合，形成一种风味独特的渝式川菜。开埠后，随着商贸业的迅速发展，城市流动人口增多，大小餐馆遍布全市。最著名的大餐馆有：宴喜园，以烧鱼翅为主的鱼翅席最为著名；双合园，以海参为头菜的海参席出名；群林宴、积义园、聚珍园几家餐馆的规模也很大。以后兴办的著名餐馆有浣花、留春榭、小洞天、陶园、适中楼、久华源、陶乐春、醉东风、白玫瑰、颐之时、新味腴、竹林小餐、金山饭店、九园等等。

照相业。重庆的照相业，兴起于开埠时期。著名的相馆有均和昌、宝记、天然楼、丽芳、春真、留真、大中华、三民照相馆等。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商贸业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驻重庆，随之有大量军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工商企业和逃难人口迁渝，重庆城市人口增加，市区范围不断扩大，1938 年人口增至 52 万多人，1944 年增至 92 万人，1946 年达到 124.5 万人。抗战时期，外地人口占重庆人口一半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30 平方公里，1939 年为防止日机轰炸，减少损失，政府动员城区机关、学校、商店向成渝、川黔公路两侧疏散。各机关迁至重庆附近 100 公里范围

内,政府将重庆周围 80 公里范围划归重庆,并划定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綦江等 5 县为疏散区。城区范围扩大到 300 平方公里。1940 年,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并由四川省辖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

战前的重庆,早已形成长江上游最大的转口商业城市,其经济辐射和吸引面已达腹地 135 万平方公里,人口 6 700 万人,包括川西、川南、川东地区及发州的遵义、贵阳、安顺一带。重庆成为陪都后,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成为当时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的商贸业,也因人口增多,供应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资增多而繁荣起来。抗战期间重庆商贸业有了新的发展。

(一) 商业企业和行业增多。1936 年重庆城内正式注册营业的店铺 1 651 家,餐饮旅店等 800 余家,总共不过 2 400 多家,1941 年全市商号(包括郊区、城区)增至 14 262 家,1945 年全市商业企业总数又增至 27 316 家。其中经营消费品的 16 118 家,占 59.04%;经营生产资料的 2 639 家,占 9.66%;经营进出口贸易的 202 家,占 0.34%;经营茶馆、旅馆及影剧院的 8 357 家,占 30.6%。地摊遍布大街小巷,有万余人靠其维生。全部商业从业人员总数达 23.43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8.17%,占全市职业人口的 39%。

战前重庆商业同业公会组织多不健全,行业公会只有 36 个。抗战爆发后内迁工商企业多,商业经营品种范围扩大,加之行业划细,到 1939 年,商业同业公会个数增至 39 个,1940 年增至 69 个,1941 年增至 86 个,1942 年增至 88 个,1943 年增为 116 个,1944 年达到 123 个,此外还有未加入同业公会的行业 37 个,实际重庆的行业公会已达到 160 个。

(二) 商业资本不断增加,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1936 年,重庆 2 000 元以上资本的商业企业仅 700 多家,1941 年增至 14 262 家,平均每家资本 8 822 元。其中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的有 2 000 余家,其中包括官民合办和官办的垄断性公司,如官办的复兴公司、富华贸易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及官民合办的四川畜产公司、四川丝业公司、中国国货公司等。

由于商业企业增多,企业规模扩大,余市商贸业总资本也增加很快。1941 年全市商业资本额为 12 583 万元,1942 年就增至 49 535.77 万元,一年之间即增长 2.93 倍,这里除有一定通货膨胀因素外,主要是各界投入商贸业的资金增多。1942 年重庆商业资本在全市资本总额中的比例高达 72.76%。1944 年全市流动资本的 86% 以上都流入商业进行投机经营。这一时期在重庆商贸业中还出现了一批特大型带一定垄断性的民营企业,如庆汇纱号、恒义升、华华绸缎公司、宝元通公司等。

(三) 市场设施和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历史上重庆的市场以农副土特产品交易为多,市场大多集中在长江、嘉陵江沿岸码头,如竹木、药材、棉花、牛羊皮及水果、蔬菜等市场分别设在太平门、铺奇门、南纪门、千厮门、临江门等水码头。重庆开埠后洋货大量涌入,新的工业品交易增多,其市场主要设在解放东路、解放西路、陕西路一线。抗日战争

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人口猛增，新迁入和新办的商贸业公司、商店、摊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城区大街小巷。

抗战时期重庆商贸业的发展方式：一是充分发挥原有商业网点和专业街的作用，如原有的棉花街的花纱市场、大梁子的小百货市场、瓷器街的瓷器市场、米亭子的大米市场、木货街の木货市场等专业街市场继续发挥其专业市街的作用，并扩大经营的规模和花色品种；原有的一些批发市场，如白象街的匹头市场，天府街的金五金市场，打铜街的颜料市场，桂花街的纸张市场，较场口的土布市场等在扩大市场场地设施后，增加市场容量，继续发挥其交换功能，保持其经营特色。二是新迁入和新办大量商业公司、商店。其中在城内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商业企业，如庆记纱号、恒义生、华华绸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四川畜产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冠生园食品公司等。这些大型企业，除在市内从事批发零售业务外，有的还经营对外贸易。新建的公司、商店的分布，除一些大中型企业布局在民族路、民权路和大梁子等老城区外，相当多的是分布在新迁入人口较多的新城区内，如新市区的大模沟、曾家岩、上清寺、牛角沱、李子坝、化龙桥。南岸区的铜元局、海棠溪、上浩、下浩、玄坛庙、弹子石。江北的溉澜溪、三洞桥、江北城、刘家台、新登口、沙湾、香国寺、观音桥、体心堂等地。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餐饮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由全国沦陷区迁渝的人口，已达重庆人口一半以上，各地风味菜品随之带入了重庆，使重庆的饮食业成为全国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行业。据1942年的统计，当时重庆有各类餐馆320家，其中川菜馆110家，江浙馆45家，京津馆27家，粤菜馆15家，豫菜馆75家，湘菜馆5家，徽菜馆3家，西餐馆25家。其中有一批老店、名店蜚声全国。著名餐馆有留春榭、陶乐春、百玫瑰、醉东风、大都会、金山饭店、竹林小餐、小洞天、九园、星临轩等。

（四）成为战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大后方对外贸易的水陆交通大部分中断，国民政府以重庆为中心，通过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航空线，保持了与国外的少量贸易往来，由财政部下属的富华公司、复兴公司、中茶公司和四川畜产品公司、四川丝业公司等几家垄断经营猪鬃、桐油、生丝、羊毛、茶叶等出口业务。由外贸进口的汽油等少量战略物资也在重庆分配运往各地。

1937年8月4日，重庆市商会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发布紧急通告抵制日货，并设立5个稽查组检查日货。紧接着四川省贸易局在重庆成立，负责办理经滇越铁路及香港进出口货物的报关、运输及保险业务。当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负责处理全国对外贸易。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重庆对外出口贸易停滞，大批出口物资积压，一些经营进出口的洋行，如利安（德商）、吉利（法商）、德昌洋等等，均因经营困难，收缩业务，最后停业。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粤汉铁路断绝，重庆出口贸易更加困难。11月，欧亚航空公司增辟了重庆至河内的航线，与法国航空公司的河港线相连接。1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为鼓励出口，颁布实施商运出口货物豁免出口税的政策。1939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3000万元收购土产出口，